



Rationality, Preference, Ideology
and Social Evolution:
an Economic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the Chinese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理性、偏好、意识形态
与社会演化：
转型期中国制度变迁的经济史解释

邓宏图/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本书出版得到南开大学“985 中国市场经济创新基地”的资助，特此致谢！

理性、偏好、意识形态与 社会演化：转型期中国 制度变迁的经济史解释

**Rationality, Preference, Ideology and
Social Evolution: an Economic—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the Chinese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邓宏图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理性、偏好、意识形态与社会演化：转型期中国制度变迁的经济史解释 / 邓宏图著.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1

ISBN 978 - 7 - 5058 - 7738 - 2

I. 理... II. 邓... III. 经济史 - 研究 - 中国 IV. F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93070 号

责任编辑：纪晓津 张 力

责任校对：杨晓莹

版式设计：代小卫

技术编辑：董永亭

**理性、偏好、意识形态与社会演化：
转型期中国制度变迁的经济史解释**

邓宏图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142

总编室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 esp. com. cn

电子邮件：esp@ esp. com. cn

北京欣舒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华丰装订厂装订

787 × 1092 16 开 21 印张 350000 字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58 - 7738 - 2/F · 6990 定价：36.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这本书终于出版了。首先，我要略为介绍一下，我在这本书里想做些什么。从这本书的题目，读者应该能猜出作者的基本意图。很显然，我的目的是要构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来解释始自1978年的中国的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我把本书所采用的理论分析框架定义为“新的历史主义的分析逻辑”，主要原因在于，我的分析是基于历史理性的分析，而非仅仅是应用新古典范式的经济人假设的理性分析。但我要赶紧说明，本书所采用的历史理性的分析框架并未全盘否定新古典范式的理性分析逻辑的合理性，而是在新古典理性分析范式的基础上增加了历史背景与历史的分析视角，只不过，这种历史分析视角下的“参与人”，其行为不仅受基于成本收益比较的寻利动机的驱使，而且表现出极强的伦理道德或意识形态的相关性，即他们的行为既受“理性”指引，也会受伦理道德规范的“指引”，尽管后者的影响看起来似乎是不明显的，是潜在的，在逻辑上似乎是“不合理”的，但它却是一种影响、“指引”甚至决定人类行为的不可忽略的、真实的“力量”。在许多情况下，行为人是不能选择道德与意识形态的，而只能被道德与意识形态所选择，此时，道德与意识形态会内化在“参与人”的行为动机中并成为“参与人”作出决策或进行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人类会“调整”、修改甚至否定他们所一贯具有的道德伦理与意识形态体系，直到出现了新的与人们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的不同阶层结构及其分布相关的、相吻合的信念体系，但这个过程往往是渐进的、边际的、短期内并不引人注目的一个过程，尽管从长期看人们会在“事后”顿悟这个变化过程的深刻性。人们会问，引起意识形态或道德伦理体系发生“偏转”或“逆转”的真正原因何在？当然，人们总会找出一个相当简约但又极为“正确”的答案，是经济上的功利目标而不是别的什么原因导致人们放弃他们一以贯之的信仰或信念体系。虽然这个答案总的来讲有其合理性，但我们还可以追问，既然功利目标是如此的重要和如此的关键，为什么在长达几千年的社会演变中，那些既为

中国的士大夫们，也为一般的普罗大众所景仰的儒家治国的理念和孔孟之道尽管不断地侵害着按商业利益原则所确立的社会分工秩序并反复地损蚀并阻碍着市场的分化与自发的演进过程，却仍然一如既往地主导着历朝历代的主流话语并成为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安身立命的基本行为准则？这意味着，人类历史并非就是一个连续的效率改进的历史，决定人类行为的也并非仅仅只有基于成本收益算计的寻利的心理动机，还有这种算计之外的别的因素也同时在起作用。人们没有必要为了新古典理性分析范式的“完美性”而改写历史，而应按历史的本来面目来思考我们的分析方法上的逻辑缺陷。至少在新古典的理性分析“范式”看来，儒家的道德伦理体系历来重义轻利，明显对商业活动中的种种寻利行为持贬抑或否定态度，而且，这种态度或者由此态度所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偏好非常不利于社会福利的改进。然而，历史却清楚地表明，在1911年前，孔孟之道、程朱理学一直统治着中国的思想界，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信仰或信念体系和基本价值观的哲学与思想之源。这意味着仅仅用效率标准来解释历史变迁是不充分的，甚至是荒谬的。

在我们看来，“经济决定论”只不过是波普和哈耶克们很不公正地对马克思经济学说所贴的一个错误“标签”，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并非是要证明经济（基础）是决定制度变迁与社会演进的唯一因素。马克思之后的诸多研究者对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及其相关理论存有误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与其说是谁决定谁，毋宁说它们是互有影响的一种“运行机制”，这种运行机制在某个时间内究竟会对社会演变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取决于这种机制所能给当事人带来什么样的预期成本和预期收益，也取决于在这种运行机制当中的当事人彼此间的力量对比及由此所“缔结”的博弈关系，这种博弈关系由不同的利益集团或个人所面对的博弈规则或博弈结构所决定并最终由一系列的博弈结果（或博弈均衡）所描述或“刻画”。

因此，一个合理的推断是，新古典范式下的理性分析逻辑尽管在经济分析史中取得过极有分量的成就，而且这种成就至今仍在影响经济分析的“走向”，但明显看来，它难以对制度变迁或社会转型提供合乎历史或经验事实的解释，如果用本书的专有词汇来“定义”这个缺陷的话，就是，它能解释参与人在约束条件下所展开的生产率竞赛，而不能解释更为复杂的意识形态竞赛。前者实际上就是一个资源配置过程，效率是它的主要测度方式；后者意味着社会思潮和信念体系的深刻变化，社会正义原则是评

论这种变化过程的基本标准。

这样一来，也就引出了我们的基本的质疑，即，在理性范式下，新古典的分析逻辑看起来似乎并不存在技术错误，相反却越来越表现出分析技术上的绝对优势，然而，由于忽略历史背景和人类行为动机的道德伦理的相关性而存有根本上的理论缺陷，由于这种范式只承认基于成本收益算计的理性而不承认意识形态会和这类理性结合在一起构成决定人类行为动机的“历史理性”，因而导致了历史与逻辑的背离而不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意味着，新古典分析范式的技术上的高超与优美并未帮助它摆脱由于缺乏历史理性的分析前提而陷入的历史与逻辑未能统一的“逻辑困境”。

但另一方面，如果伦理道德的相关性对人类行为并不重要并因此可以忽略不计，则新古典范式下的理论分析无疑又是十分成功的。然而，我们到哪里去寻找与伦理道德或意识形态无关的“人类行为”呢？

下面，我们想对书中的各章作一个极为简洁的介绍。

第一章，我们讨论了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前提，在此基础上，我们对波普尔把历史唯物主义看做“历史目的论”或“历史决定论”进行了批驳。通过分析改革前社队企业和改革后乡镇企业的“历史关系”，我们指出了新古典范式下的主流经济学由于缺乏对于这类历史关系的分析而陷入了某种“范式危机”。我们在逻辑上得出必须重建历史主义经济学分析方法以实现“范式转换”的结论。

第二章，我们分析了经济理性与非理性的逻辑结构及其两者间的关系。我们认为，经济理性是一种精于算计的逻辑结构决定的心理动机，“非经济（的）理性”则与习俗、传统、道德、社会价值相关。它们两者共同作用，一起成为调节社会资源的“心理”媒介。本章通过分析“类”、“异化”（马克思经济学的一种惯常用语）、“同情”、“承诺”、“人的初始权利禀赋”以及“经济理性”和“非经济（的）理性”对企业家行为的影响机制而得出一个重要概念，即“历史理性”。“历史理性”在我们的研究中是具有原命题意义的理论假设，是本书的历史主义分析所必备的、重要的理论基础。读者会发现，这一章有相当多的阿玛蒂亚·森的思想痕迹，甚至于有更多的马克思的思想和分析逻辑对我的影响。我记得，国内有个著名学者对我说过，他在写作时是十分注意摒弃马克思的思想对他的影响的，甚至避免出现任何与马克思有关的字眼。在我看来，这是不必要的，甚至是一种学术上的矫揉造作。这种做法拒绝了一种发现社会异化本相与资本的社会本质的“思想通路”，因而是不明智的。

显然，第一章和第二章是我研究中国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的“分析基础”或“逻辑基础”。

第三章，我转向了经验研究。我把第一章、第二章所发展出来的历史主义的分析逻辑直接应用于始自1956年的中国的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在这一章，我的研究表明，在1956年完全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中国就进入了充满“二律背反”的过渡期。1978年开始的改革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就埋下伏笔，“体制困局”成了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逻辑起点”并使改革具有“内生性”与“渐进性”，20世纪80年代初进行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正是试图走出“体制困局”的一次实际尝试，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则是对“困局”的回应，但是否由此彻底地走出了“困局”，这个问题要由历史的实践来回答。即使如此，我们不能不惊叹于毛泽东为代表的政治哲学家们对“人类困局”以及如何超越这种“困局”所做的非凡探索。历史或历史逻辑起点对制度演化轨迹的影响，是通过塑造参与改革过程的社会公众（参与者）的信念而实现的。公众信念是决定改革走向的关键性力量，因此确保改革策略与公众信念一致性是成功转轨的关键，要保证所有领域的改革获得彼此协调性并取得最终成功，就应使与不同领域改革策略相一致的参与者信念彼此间出现最大公约数。改革并不意味着否定历史，它只是针对历史而进行的一系列的创造性调整和转换。不同类型经济组织和不同地区生产率竞赛则使制度变迁超越“体制困局”从而使改革不可逆转，这种制度竞赛也是促使公众信念和偏好向“好的”改革策略“收敛”的实质性力量，这使“改革策略与公众信念一致性”的转型原理具有更有效、更丰富的理论与政策内涵。

第四章，仍然是我在第一章和第二章所发展出来的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的一个逻辑应用。通过引进历史逻辑起点、生产率竞赛、制度互补和企业治理等关键概念，我试图对中国民营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演进论解释。本章认为，在转轨时期，地方政府的意识形态偏好会决定其民营经济政策进而影响民营企业形成对未来的预期，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间构成的生产率竞赛和制度互补关系会共同塑造某个特定地区的“制度互补特性”从而导致不同地区民营企业选择不同的企业治理结构。在不同地区各自历史条件约束下，那些较快、较为彻底摆脱传统意识形态偏好的地方政府将促使民营企业迅速获得组织的交易效率优势，从而使民营经济进入一个持续地进行自主组织创新的过程，这是温州模式的由来；

那些稍慢摆脱传统意识形态偏好的地方政府会以基层政权的形式参与企业的发展过程，因而发展出了具有模糊产权结构的乡镇企业，这是苏南模式的由来；那些固守传统意识形态偏好的地方政府，更看重国有企业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从而不能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合理的政策环境，这使民营企业缺乏稳定预期，因而不能使民营经济获得效率上的比较优势，这恰恰是中、西部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现状。当然，这一章的分析更多的是“技术性”的而非“历史性”的。单纯从效率角度看，民营企业的确比传统国有企业具有某种比较优势，但是，如果一旦引进历史因素，例如社会正义与社会公平，则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比较研究将比本章所呈现出来的分析逻辑更为复杂。进一步，如果考虑国有企业在历史上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则对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效率比较就会有更为深刻得多的“历史主义”的阐释。

此外，本章对“意识形态”作了简化处理，如果我们把“意识形态”问题还原到社会信念的选择层面，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定位及其关系就会有一个更为妥帖的结论。这个工作将在第五章进行。

第五章是要对中国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提供一个全景式的历史主义分析视角下的理论解释，也是第三章和第四章的经验分析的自然的逻辑延伸。本章通过分析近30年来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在给定历史逻辑起点等约束条件下彼此构成的生产率竞赛、意识形态竞赛和制度互补，为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组织演化或制度变迁提供经济史的解释性分析框架。本章认为，历史逻辑起点为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经济组织的演进分岔提供了既是潜在的，又是可辨识的决定因素，而生产率竞赛和制度互补共同塑造的“制度互补特性”则显在地使这种演进分岔成为现实。此外，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并不单纯由生产率竞赛所决定，在生产率竞赛的同时也伴随着意识形态竞赛，这两类竞赛及其相互作用构成了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的“动力机制”。应当说，这一章与第三章、第四章构成了我对中国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的历史主义分析视角下的理论解释的“逻辑整体”。

第六章是我尝试用历史主义的分析框架对中国农地制度变迁所作的一个理论解释。自我国农村社会经济转型开始至今，许多有关农村制度变迁与合约选择的文献对此进行了相关研究并深深影响了学术界、决策界对家庭承包制、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判断。本章对此进行了严格的理论评析。交易成本不仅产生于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委托代理，也产生于人们所缔结的

合约结构或所选择的组织形态不能与产权的多重属性达成必要的一致。与流行的观点不同，本章认为，农村集体产权或集体（合作）经济组织仍然是可选择的。在此基础上，本章概要性地比较了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产权与联产承包制下的集体产权的各自特征。

我一直觉得，国内学界对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也颇有成就，甚至某些观点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但仍感不足。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许多研究缺乏历史视角。

为此，我尝试把历史视角引入到我的分析中，我称这种方法为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我要指出的是，我们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社会转型，我们的制度变迁，均与历史逻辑起点有关。这个历史逻辑起点，简单说来，就是中国自1949年以来所累积而成的特有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制度性的遗产”，这个遗产，使我们的改革开放呈现出与前苏东国家的改革不一样的路径。

已有翔实的资料证实，1979年中国的农业大丰收，不仅与联产承包责任制有关，更与中国的化肥产量、与中国的杂交水稻技术等农业科技进步有关，是后者，而不仅仅是前者引发了中国的农业改革的成功，这使人们一开始就有了一个好的改革预期，改革成功也就顺理成章了。那么，我们要问，化肥产量究竟因何原因在1978年前后迅猛增长了？杂交水稻等农业科学技术因何缘故在1977年前后有了一个极大的改进呢？这都可以追溯到我国改革开放前所留下的制度性的或物质性的遗产，借助于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我们才能真实地评价中国的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

我们发现，中国人在1978年前的社会信念或意识形态与此后的社会信念与意识形态出现了一个泾渭分明的“分水岭”，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社会学或政治学现象，那么这与中国的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有什么关系呢？我的答案是：原来，伴随着不同所有制或不同类型的企业，比如国有的企业、民营的企业彼此间的竞赛，彼此间的“你争我夺”，必然会有一个舆论上的“你争我夺”，为了证明民营企业更有活力和更具竞争力，就必然要在治理结构上作更多的改进以胜过其他类型企业的治理结构，唯如此才能说服那些一直坚守传统价值观的各阶层人士；与此相应的是，那些具有所谓改革倾向的人们也会找出各种说法来证明他们的选择是有道理的，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因之，他们就要（总结甚至）“发明”出一整套的话语体系，来推翻人们脑子里的先前的关于社会发展的各种主张或者意识形态，这就是意识形态的竞赛了。显然，意识形态的竞赛会影响改革的进程与路径。

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把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原则贯穿进社会发展的程式当中，是效率优先原则，还是正义优先原则呢？实际上，正如本书反复说明的，正义原则本身包含着效率上的考量，与效率原则本质上并不矛盾，但同时它还考虑公平问题，寻求效率与公平的平衡。显然，以效率为唯一取向的各种政策选择是有问题的，原因在于社会转型与制度变迁必须符合正义原则，必须反映社会公众的普遍意愿，必须使改革策略与公众信念保持一致性。

本书还收录了两个附录，每个附录各自构成独立的一章。

在第一个附录中，我们特别强调了中国社会的转型背景。基于对集群的传统认识和主流经济学的解释，我们围绕制度、技术（知识）创新等变量对企业集群的演进过程进行了详尽研究。在历史视角下，我们考察了制度、技术外溢与集群默示性知识形成的相互关系，我们发现地方政府在这些关系中具有某种独特的作用。通过考察天津自行车产业集群的演化轨迹，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在转轨条件下，政府的意识形态偏好和政策偏好甚至是构成并决定企业集群自身的“默示性知识”和“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素。这个结论与本书第四章所得到的结论具有某种逻辑上的“对应性”和“一致性”。

在第二个附录中，我们发现，对一个转型社会来说，贫困是由于导致贫困的“制度”，后者与教育（人力资本）、投资、消费等因素共同形成了一种具有循环累积性的“联动机制”，最终使农民既缺乏能力，又缺乏权利，陷入到某种制度性的贫困状态中。此外，社会转型也导致了原有产业、就业结构乃至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从而使原来适应于传统社会的农民难以适应转型过程中及其转型后的社会，进而成了马克思意义（或马克思语境）上的绝对贫困者或相对贫困者。要打破这种制度性的“贫困锁定”，一个可行的政策选择就是在农地承包制的基础上重建合作经济，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发展农村金融，构建有效的社会保障体制，在把传统农业改造成现代农业并同时发展更多的非农产业。这个结论与第六章的结论具有某种逻辑上的“对应性”或“一致性”。

我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两个“附录”是我和我的两个学生（他们分别是康伟和赵玉亮，现均在南开大学商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共同完成的，最初的目的是尝试用历史主义的分析视角来解释转型中的企业集群的演变与农村何以会出现制度性的贫困问题。在此，我要感谢他们对本书的贡献。

我记得，大约1986年，我父亲想和我讨论几个问题。他问我，我们

现在走的还是社会主义道路吗？我听后斩钉截铁地说，毫无疑问，我们走的就是社会主义道路。父亲知道我其时正下工夫读《资本论》，三卷快读完了，才试图与我讨论他十分关切的问题。事实上，当初我并未真正读懂这三卷《资本论》的。父亲听了我的话，没有再说什么。我不知道他是失望呢还是困惑。

我父亲邓柏林是一个标准的、传统的、忠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基层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冲击，曾被几个红卫兵打得半死，最后被一个老乡救下才活过来。即使如此，他谈起毛泽东来仍显得十分激动，1958年他作为英模代表在北京见过毛主席。他跟我说过，挨过打才知道任何时候都要和群众在一起。1977年，他开始尝试让公社社员利用荒滩地头、房前房后搞多种经营，主张把生产队分成若干个作业组，各自核算，展开生产竞赛。这些看来并不过激的主张也被当时他的上级给否定了。从此我父亲脸色沉郁，时运不济，似乎再没缓过神来。1988年，父亲患急病去世。此后我时不时会感到一种深深的悲戚与孤单，因为我再无法与父亲对话。让我感到深深失落的原因还在于，等我觉得可以回答父亲问题的时候，他和我已是阴阳两隔。这本书，我要献给我亲爱的父亲，他给我以永不衰竭的动力。

2004年，母亲也去世了。当时我博士毕业不到一年，正从事博士后研究。我感到分外无助，在母亲患病后竟然拿不出多少钱给她治病。我知道，我母亲是不愿意这么早就离开我们的。这本书同样要献给我亲爱的母亲熊友华，她给了我永恒的爱，这种爱让我清醒地知道自己的定位与方向。

我要感谢我夫人杨军花和女儿邓格致，她们一如既往地支持我，给我以持久不断的信念与信心。我女儿邓格致今年上小学六年级，已读过不少书了，时常要和我讨论一些严肃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这使我得到许多安慰和快乐。

我还要感谢我的学生：崔宝敏、赵玉亮、杨晓阳和程霞，她们帮我改正了本书的诸多错误。有必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第六章，是我和崔宝敏合作完成的，她的贡献不可忽略。让我向她表示真诚的谢意！我的学生李德良帮我收集了第六章的有关文献，尽管最后经我之手这些文献才得到细致的整理与归类，我仍要向他表示我的感激。我还要向我的三个姐姐邓丽君、邓美君、邓美玉以及弟弟邓君致谢。他们非常理解我的工作，常常给我以物质的和精神的鼓励。

周立群教授和谢思全教授为我多方筹集经费，使本书顺利出版，我要

向他们表达我坦诚的感谢！我的同事安虎森教授，在学术上、在生活上给予我诸多帮助，我向他致以我的崇高敬意！此外，我还要感谢曾聆听其教诲的周冰教授、柳欣教授对我的作品的关注。

受杨其静博士、聂辉华博士的热情邀请，我在2008年11月初到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组织与企业研究中心作了一次学术报告，因此，本书第四章、第五章得到了其静博士、辉华博士的认真、直率而客观的评论。他们对我的理论建构与技术上的评论可谓一针见血，不仅显示出他们极强的理论分析能力，更表明他们在学术上的真诚与执著，但可惜的是，限于时间，我无法在本书完全回应他们对我的观点与方法的质疑。我愿意在此承诺，我会在另一本即将出版的书里认真采纳他们的意见，以完善我对某些学术问题的看法。在此，请允许我向他们表达我的敬意！

显然，我要对本书的所有可能的错误负责。如果本书真有其价值，那么它自然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如果本书被证明充满谬误，那么时间会作出严格的评判。

最后，我还要向一切关心我的朋友们表示感谢！让我们共同在学术和思想的路上行进，以期对人类的知识体系有一个边际上的贡献。

邓宏图，于南开园求是斋

2008年11月



自序	1
第一章 历史主义经济学分析方法的重建：经济学解释的“范式困境”与“范式转换”	1
一、回归古典：理论上的可能性与现实上的可能性或必要性：一个导论	1
二、历史视角下的经济分析：以马克思经济学的逻辑结构为例	10
（一）马克思经济学分析基础	10
（二）历史与逻辑：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分析的“总原理”	12
（三）对波普尔的“反讽”：目的论	13
三、转型的含义	14
四、意识形态与社会正义	18
五、制度与制度变迁	22
六、经济学的范式危机与范式转换	26
（一）范式和范式危机的“注解”	26
（二）历史视角下的集体经济、社队企业与农村市场化	31
（三）范式转换：历史主义的经济分析框架	32
七、历史逻辑的可验证性：民营经济的由来与演进的 历史视角	36
八、本章结论	39
参考文献	40

第二章 历史理性：“新历史主义分析方法”的基础重构	46
一、本章开篇：理性范式的质疑	46
二、“理性”考：它的内涵与外延	51
三、哲学与经济学的“理性”：一个简约的比较	52
四、鲁宾逊孤岛“理性模型”与西蒙的“有限理性”	57
（一）一般性理论说明	57
（二）鲁宾逊“孤岛理性模型”与“有限理性”	58
五、马克思与阿玛蒂亚·森：考虑权力配置的“理性”	63
（一）马克思的“类”与“异化”	63
（二）阿玛蒂亚·森的“可供交换的权利”与“同情”和“承诺”	68
六、森的“故事”与社会化了的“鲁宾逊孤岛模型”的讨论	72
（一）用故事表达的模型	72
（二）加进社会因素的鲁宾逊模型的讨论	74
（三）信念体系与历史理性：概述与理论总结	80
七、历史理性的经验证据：以企业家为例	86
（一）企业家理性与历史理性	87
（二）理性、信念或意识形态决定下的企业家选择和企业家精神	90
八、组织的历史理性：一个简单的推论	94
九、基本结论	94
参考文献	96

第三章 历史分析：“体制困局”与改革的内生性	99
一、历史逻辑起点与体制困局：一个历史主义的解释框架	99
二、“体制困局”与改革的内生性和过渡性	105
（一）“体制困局”与政治路线的“二元取向”： 向左转还是向右转	105
（二）饥荒问题：事变、转向与古典的“仁政”	107
（三）经济压力与实践（现实）主义路线	111
（四）“体制困局”与改革的内生性、渐进性和过渡性	114
三、生产率竞赛与对“体制困局”的超越：历史背景与历史经验	119

四、改革策略与公众信念的一致性：一个“转型原理”的基本阐释	123
(一) 历史或历史逻辑起点的进一步阐释	123
(二) 1956~1978年：有必要再次强调的演化观点	124
(三) 公众信念与决策者改革策略的一致性	125
(四) 改革的动力与贝叶斯修正：从“不一致”到“一致”	129
(五) 转轨“样式”：一致性命题与中间性制度安排	133
(六) 社会和谐的基础：进一步的讨论	135
五、本章结论	140
参考文献	140

第四章 意识形态偏好、地方政府政策与制度演化分岔：

一个民营经济的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	145
一、民营经济演进：一个理论说明	148
二、地方政府意识形态偏好和政策的内生性	150
三、地方政府意识形态偏好与政策偏好：政府内部成员博弈的简单说明	153
四、地方政府意识形态偏好与地区经济制度变迁	154
五、不同地区经济组织演进与制度变迁的“路径分岔”：制度互补特性与“多重均衡”	160
(一) 基本假设	160
(二) 讨论	162
六、经验证据	165
七、计量检验	167
(一) 计量模型的理论说明	167
(二) 计量估计结果及其说明	170
八、本章结论	171
参考文献	172

第五章 历史逻辑起点给定下的生产率竞赛与意识形态	
竞赛：中国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的经济解释	175
一、导论：生产率与意识形态的竞赛	175
(一) 生产率与意识形态初解	175
(二) 制度变迁的历史逻辑	176
二、转轨与“历史逻辑起点”：经济史简要说明	183
(一) 公共意志（偏好）与“重化工业”路径：对林毅夫“赶超战略”分析范式的质疑	183
(二) 历史遗产	188
三、1979年开始的转轨：生产率竞赛与意识形态竞赛	199
(一) 生产率竞赛：基本假设与理论	199
(二) 双轨制中的斯塔格尔伯格与伯川德过程：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生产率竞赛	203
(三) 历史前提、生产率与意识形态竞赛：一个总结性说明	213
四、本章结论	216
参考文献	217
第六章 转轨中农地租约的政治经济学：合约选择与制度变迁的历史逻辑分析	220
一、农地租约的历史主义视角	220
二、组织与激励：一个评论	223
三、一个鲍尔斯式的纯理论模型：联合（集体）产权与合约选择	237
四、地权性质与合约选择	239
五、公共属性与组织结构	245
六、人民公社与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个经济史的比较分析	252
七、1971~1991年粮食产量的决定：水利、技术、化肥还是联产承包制	257
八、农地租约或合约选择逻辑的进一步的诠释：有关合作经济的案例分析	262

九、结论性评述：杜润生的“中国农村制度变迁”与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的辨析	273
参考文献	276
附录一 历史视角下的企业集群	280
一、企业集群理论概要：从传统集群学说到新经济地理集群学说	281
二、企业集群理论的一个扩展：双层气泡假说及相关命题	284
三、转轨条件下的企业集群：政府、制度、技术外溢与默示性知识	286
四、经验例证：天津自行车产业的民营化与集群化的演化轨迹	290
五、基本结论	292
参考文献	292
附录二 制度与贫困：以中国农村贫困的制度成因为例	296
一、导论：贫困问题的概要性阐释	296
二、制度与农村居民贫困：一个理论说明	298
三、人力资本与户籍制度等因素的“制度效应”：一个检验	303
四、结论	311
参考文献	311
后记	314